

德国通向 希特勒独裁之路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HITLER-DIKTATUR

[联邦德国] 海因茨·赫内 著

商务印书馆



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 著

张翼翼 任 军 译

宋 钟 璜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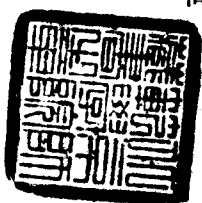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8780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年·北京



1128780

Heinz Höhne
DIE MACHTERGREIFUNG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HITLER-DIKTATUR

Veröffentlicht im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Februar 1983

根据联邦德国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 1983 年 2 月版译出

DÉGUÓ TŌNG XIÀNG XÌTÈLÈ DŪCÁI ZHĪ LÙ

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 著

张翼翼 任 军 译

宋 钟 璜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790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6 千

印数 4,500 册

印张 9 1/8

定价: 2.1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书名全译是《夺权——德国走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现用书名是原书名的副题。原书由联邦德国《明镜》周刊作为该刊丛书之一初版于1983年2月，全书共分六章约二十余万字，主要叙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所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历经风风雨雨十四年后，又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滑入法西斯独裁统治之路，从此德意志民族再度陷入战争的苦难深渊。从本书概述的历史时期和内容看，实际上是一部反映作为纳粹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形式出现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滋生、发展、崛起的历史专著。然而，本书并非出自科班历史学家之手，而是由青年时期经历纳粹统治、战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明镜》周刊编辑海因茨·赫内所著。他结合新闻工作对德国现代史有较深的研究，著有《党卫队——佩图腾标志集团》和《卡纳里斯传》等书，在联邦德国史学界颇受重视和好评。作者在本书中运用了新闻记者的特有笔法，深入浅出地生动勾画了这段历史，有血有肉，富于情节，使许多重大事件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较深的印象，作者还在书中夹叙夹议，以叙为主，提出一些独特见解。这些都是本书的特色。

但是作者由于阶级局限，不免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方法出发，对当时德国共产党的自卫行动与纳粹党的挑衅行为往往等同视之，完全混淆了是非。上述提法读者不难剖析、区别。就全书而言，作者主要着墨于揭露法西斯主义的丑恶面目，同时也鞭撻了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庸碌无能以至它们的机会主义路线。从这一意义上讲，本书对我国广大读者在了解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台并从中吸取历史教益不无参考价值。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民主派的自杀	19
第三章 纳粹来了	69
第四章 最后机会	137
第五章 1933 年 1 月 30 日	189
第六章 夺权	231
注释	269
人名索引	287
参考书目	295

第一章 导言

7

早晨,共和国的生活看来还是平静如常。没有任何迹象表明,1933年1月30日这个星期一会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柏林人打开报纸,也只读到一些惯常发生的事情:周末,象往年一样在动物园的礼堂里举行了招待新闻界的舞会;德国花样滑冰优秀选手启程前往伦敦参加欧洲冠军赛;“纳努克”的伊尔姆加特·冯·奥佩尔在凯塞达姆体育馆如期举行获得共和国大奖的赛马表演,给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只是天气预报使人感到有些惊奇,气象专家报告,整个北德沿海地区,气温将从上星期五的零下二十度急剧回升到零上四度。所有报纸对星期一凌晨的解冻发出了警告。^①

在星期一上班情况极为稀稀拉拉的气氛中,正当有些消息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第二主席汉斯·福格尔预示政治形势有所急转时,人们几乎都能觉察到他的反应仍然有些迟钝。在菩提树下大街三号党中央所在地办公室里,他从其他领导同志那里听到发生的事情更使他迷惘: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听说,白发苍苍的德国总统兴登堡要任命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当德国总理,如果他已经准备好凑足一个议会多数的话;而鲁道夫·希法亭则想知道兴登堡曾宣布过反对希特勒组织内阁。

让希特勒进入德国总理府,让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掌权,这对福格尔同志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自从希特勒的党在最后一次国会选举中遭到惨败以后,对福格尔和执委会的其他同事来说,民族社会主义本来已经不成为话题的了。1932年五次竞选以后,社会

民主党第一主席奥托·韦尔斯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在这一年内，在‘打倒希特勒’的口号下接连经历了五次交锋，在第五个回合以后他被打倒了。”一月中旬，身患高血压的韦尔斯启程前往瑞士阿斯科纳疗养。这件事不足为奇。他简单地认为，“灾难没有临头”。②

不，汉斯·福格尔未能体察到布赖沙伊德和希法亭内心的激荡。他对那家造谣公司从不感到兴趣，这家公司从德国总理库特·冯·施莱歇尔倒台以来制造了有关希特勒和兴登堡的宠儿弗兰茨·冯·巴本之间秘密会谈的日益离奇的消息。福格尔宁可相信柏林《克拉德拉达施》*报的消息。这家报纸在1月29日还讽刺地写道：“这位纳粹权贵吃过早饭上午干了些什么呢？午饭后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在利珀和凯尔歇斯朗德之间消磨他的夜晚吗？还是在利珀和科隆之间呢？难道他就是这样为他的党攒钱吗？或者他正鬼鬼祟祟地出没在柏林的街道上？……希特勒呆在哪儿？这个问题不刺耳吗？”

但是，福格尔也渐渐发现总理和总统官邸所在地威廉大街正在酝酿着危险的事情。夜里已有谣传，说施莱歇尔打算发动反对兴登堡的政变，且已命令向波茨坦驻军报警。福格尔大概还没有忘记1931年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说过的话，国防军决不允许希特勒爬上德国总统的宝座。可是，这不是很久的事了吗？福格尔同志顿时感到心慌意乱。

- 9 现在，福格尔也变得神经紧张了。他把所有能来到柏林的党执委会成员、国会党团的领导人和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联合会的一些领导干部召集到国会大厦开会，会议还应在上午开始。

大约刚过11点，福格尔关上身后会议厅的门走进了大厅。大

* 原文 Kladderadatsch, 1844年—1944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讽刺报，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译者

厅里聚集了首都最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党员。这时，他所面临的是笼罩在大厅里的、几乎无法掩饰的一片不知所措的愁云。国会党团主席布赖特沙伊德以他常有的敏锐目光宣布，党正“处在把法西斯分子从台上赶走的紧急关头”。但是，他的大多数同志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为时已晚。希法亭认为，一些迹象表明，执政的并不是希特勒政府，而是一个非政治的文官内阁。福格尔也指出，情况还“极不明朗，现在先不急于作出决定”。④*

只有两名左派，工会主席西格弗里德·奥夫豪泽尔和卡尔·利特克表示异议。利特克抗议道：“文官内阁只能看成是给希特勒占位子的人，我们仍须号召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我们应当表明我们的态度。”但在这时，普鲁士总理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权人物”奥托·布劳恩却粗暴地警告说，决不能“干任何无意义的事”。他嘟嘟囔囔地劝说要耐心等待。另外，他似乎还觉得，在兴登堡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易北河以东地区的统治阶级是“不会让那个画匠上台的”。⑤

面临这些分歧意见，全体同志对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机敏的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起草的一项决议达成了一致协议，并为此表示高兴。这个决议指出，社会民主党“准备毫无保留地支持任何政府，只要它旨在国内结束混乱局面，恢复符合10宪法的法制国家的状态”。全体一致同意，尽可能在《前进报》的晚报上刊登这一声明。

施坦普费尔拿着手稿匆匆走到过道里的电话室，正想把全文通知编辑部。他拿起听筒后，从过道里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他开始并没有听清楚喊的是什么。后来他完全听明白了：“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⑥

灾难降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愈益缩小的其他民主政党与

* 原文缺注③。——译者

组织的阵营所曾反对和加以抑止的事情，当然也包括许多共和国保卫者听天由命地所认为的事情，犹如一场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成为了严酷的现实：阿道夫·希特勒成了纳粹党人和顽固保守党人联合政府的首脑，并占有了政权。魏玛“制度”十四年的死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德国最主要的执政党。

但是，在国会会议厅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一时代的征兆却一直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回到会议厅的施坦普费尔来说，希特勒的上台也只不过是一次“延长了的卡普暴动”^{*}罢了。是的，他的许多同事甚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们过去是否真正对这个总理希特勒有过充分的注意。^⑦他们认为，危险的不是希特勒，而是新任的经济和粮食部长、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这个“反动头子”（《前进报》语）。社会民主党人预感到他是新政权的实权人物，并把他看作未来的德国独裁者。也有另外一些民主派人士受到了这种谬论的影响。天主教青年联盟的报纸《青年中央报》就曾发出过警告：“胡根贝格上台，国民要当心！”^⑧

- 11 在这样的时刻，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除了决定利用惯常的议会形式反对希特勒—胡根贝格—巴本政府外，没有任何其他创举了。同志们立即作出决定，正如多年来社会民主党通常所做的那样，先在国会提出一项对新总理的不信任提案。这当然引起了福格尔的同事们几分兴高采烈的情绪。然后，他们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起草了一份声明，以此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对希特勒政府这个“反动的大资本家和大农业主联合体”的立场。是发动起义来反对这些身穿褐衫、手举黑白红旗帜的共和国的敌人吗？是号召举行争

^{*} 指 1920 年 3 月由东普鲁士地方长官卡普为首发动的、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复辟旧政权的一次未遂政变。——译者

取民主的群众性游行示威吗？不，起草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呼吁支持者（“劳动大众！共和派们！”）要保持镇静和审慎。他们声明的核心是：“冷静，坚定，纪律，团结再团结，这就是当务之急！”^⑨

当布赖特沙伊德在下午的一次连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议员威廉·赫格纳也感到“毫无意义和缺乏目的性”的国会党团会议上向议会党团解释党的这一立场时，有一部分人对他的话感到不安，而另一部分人则面露失望情绪，反映议会党团早就期待它的领导作出另一种比较强硬的反应。但是布赖特沙伊德一再郑重表示，党必须等待，党不允许过早摊牌。“准备就是一切！”这就是他第二天公开发出的口号。^⑩

傍晚，透过国会大厦的窗户传来了模糊不清的喧闹声，议员们开始未能明白这是什么回事。不久，来自城里的几名来访者告诉他们：几千名柏林人穿过街道涌向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前往威廉大街。这是由纳粹党大区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发起的，他动员了二万五千名冲锋队员手持火把，奏着进行曲，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宣传性游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武装组织“钢盔团”的队伍¹²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纳粹分子又一次抢先走到他们对手的前面去了。共和派防卫组织和“国旗队”*的黑红黄三色被充塞在柏林街头的冲锋队和钢盔团的褐色和灰色**所代替了。

当赫格纳和他的巴伐利亚籍国会党团的同事们在暮色苍茫中准备从动物园附近的火车站搭车返回慕尼黑时，他就发觉到了这一点。赫格纳回忆道：“无数钢盔团成员和冲锋队员涌向勃兰登堡门。青年，全是一些年轻无知的青年。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孩儿脸，

* 原文 Reichsbanner，旧译国旗社，系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成立于 1924 年。——译者

** 黑红黄三色指魏玛共和国国旗颜色；褐色指冲锋队员制服颜色；灰色指钢盔团成员的制服颜色。——译者

来去匆匆，神情激动，他们‘正在值勤’。他们奔向今晚为兴登堡和希特勒组织的火炬游行队伍。耀眼的灯光从‘菩提树下’大街照来。我们被当天的激情弄得疲惫不堪，拖着步子走向黑暗之中。我们只有尽快离开柏林，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东西了！”¹¹

被戈培尔这场突如其来的戏剧性表演而弄得沮丧的人不只是这位巴伐利亚人。民主主义者、外交官兼文艺爱好者哈里·格拉夫·克斯勒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今晚的柏林笼罩着一片酷似狂欢节的气氛。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队伍以及穿着灰制服的钢盔团通过各条大街，围观群众在人行道上拥挤得水泄不通。聚集在‘皇宫’及其周围的人群一片欢腾。在主要入口处和大厅里，身穿制服的党卫队员组成夹道欢迎的行列。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在许多通道上进行巡逻。当我们听完演讲走出来时，看不到尽头的冲锋队员正在正步行进，从那些权贵人物身旁走过……整个广场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¹²

维护旧共和政体的人用惊愕和诧异的眼光注视着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善于动员群众、并用新的口号对他们进行鼓动的非凡本领。大街上的吵嚷没完没了，越来越多的人聚众闹事。前中央部长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激动地打电话给罗斯托克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布龙施特德神学教授，这位教授又把刚听到的情况马上告诉

¹³ 他的学生欧根·格斯登美尔：“柏林一片乱糟糟。有人用火炬游行和类似的愚蠢举动向希特勒致敬。但愿这种胡闹很快就收场。”¹³

可是，有一些共和主义者早已看出这场“胡闹”不会自动收场。他们赶紧组织了反示威游行，为的是不让希特勒和胡根贝格这伙人单独在大街上胡作非为。在一些城市里，形形色色的民主派人士为反对新的统治者组织了抗议活动。柏林国旗队的领袖勒文施泰因亲王胡贝图斯自豪地看到由他迅速发起的夏洛滕堡地方协会的群众集会有二千人参加，其中许多是青年人。勒文施泰因在会

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大声疾呼：“同志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开始了，你们明白吗？”^⑭

许多忧心忡忡的共和主义者也怀有类似的想法。他们当晚赶到柏林，鼓励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迎头痛击希特勒及其政府。几乎全国各地的党的书记、工会领导人和国旗队的领袖都呼吁要采取行动。座落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党中央机关对象潮水般涌来的电话、电报几乎应接不暇。人人要求行动起来，人人等待着出击的信号，人人要求得到建议和帮助。

此刻，党和工会多年来等待的时刻确实来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早已预料到纳粹要上台，而且在最近举行的示威活动中的宣讲人几乎每次都提到，在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的那天，德国工人阶级将不仅用选票而且也将用拳头来作回答。早在1932年，柏林警察局长阿尔伯特·格谢辛斯基公开要求“用打狗的鞭子”赶走希特勒。国旗队更不相信其对手的传记*，并宣布：“把这个外国的捷克**杂种、挑拨者阿道夫·希特勒驱逐出境！”^⑮

在德国的社会团体中看来还没有一个团体在反对纳粹篡权方面比忙忙碌碌的共和主义者准备得更好的了。1931年年底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工人体育组织联合组成的“钢铁阵线”拥有成员多达三百五十万人。几个月来，在他们的队伍一直流传着“今天我们行进，明天我们战斗！”这一战斗口号。钢铁阵线的坚强核心是由二十五万名防卫队（简称“舒福”***）战士组成，是国旗队的一支精锐战斗部队，其成员身穿绿色制服、黑马裤，系背带，戴蓝帽，这些几乎难以掩饰他们是从惹人厌恶的冲锋队那儿学来的。^⑯

* 指希特勒写的自传，即《我的奋斗》上卷。——译者

** 指波希米亚。——译者

*** 原文是 Schupo，系 Schutzformationen 的缩写音译。——译者

“舒福”的建立要追溯到社会民主党的负责人。他们在 1931 年年中决定建立一个万一在纳粹分子夺权情况下进行抵抗的组织系统。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党中央机关设有能与党的三十三个专区组织进行联络的无线电网，它由柏林附近哈韦尔岛上一间用树干搭成的木屋里安装的电台所控制。同时，党中央为了进行地下斗争，还在柏林租了几套用作秘密活动的住宅和秘密备用住所；此外，还建立了一支配备手枪、卡宾枪、机关枪的秘密卫队，其任务是保护党领导的住所以对付纳粹分子的突然袭击。^{①7}

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亲信跑遍全国，鼓励党的地方组织设立抵抗的基层组织，建立报警系统。汉堡地区的组织还成立了一个名叫先锋队的战斗联盟；在这个组织里，人们能在两小时内向青年党员发出警报，并能使他们在这座汉萨城市*的所有地区投入战斗。汉堡的社会民主党拥有五千名这样的先锋队员。党在其他地区，在萨克森、汉诺威和马格德堡，还建立了许多“五人小组”领导地下斗争；仅莱比锡地区就约有二百五十个“五人小组”，归一名秘密的“最高领导人”统一指挥。统一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团结起来！一切为了自由！”^{①8}

党的执委会在这些抵抗组织中最重视的是“舒福”。队员们在国旗队精力充沛的联盟主席卡尔·赫尔特曼领导下，学会了军事基础知识。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共和国军官手里的警察教练对他们进行了阵地战和巷战的演习训练。^{①9} 有计划的战地服务训练、使用步枪和机枪的训练、急救课程和政治教育课使“舒福”增强了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暴力较量的战斗力。甚至连伤员的病房和战斗部队的补给供应站也都准备就绪。

考虑周密的协同作战计划和精心设计的报警系统也都完备无缺。赫尔特曼是这次直接行动的至善论者和幻想者。在他看来，

* 即指汉堡。——译者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例如马格德堡地区党的一项协同作战计划规定,在一次纳粹暴动或其他形式夺权之后,要占领所有铁路枢纽,封锁铁路线段和公路,炸毁桥梁,切断电话联络。舒福各部队应在最短时间内即能出击。在柏林,报警命令已经拟好,规定只需填上时间就可发出。在汉诺威,每一百名舒福队员就有一个秘密集合地点,他们只要听到出击信号,不佩带徽章,只穿隐蔽式风衣,就能立即赶往该处。²⁰

只是在武器装备问题上并不那么顺利,因为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对赫尔特曼的“兵戈游戏”一直持不信任态度,不许舒福去筹集武器。韦尔斯所寄托的希望是,在紧急情况下,只有保安警察局才能向共和国的保卫者打开它的武器库。赫尔特曼认为,这是患了精神脆弱症的党的领导人的一种托词,并允许舒福队员自筹武器。这样,民主派的精锐部队终于有了手枪,有些人还有了卡宾枪,这些武器大部分来自保安警察局。

舒福和国旗队如今已这样严密地组织起来,使得赫尔特曼和他的下级领导人对起用这些战斗部队不再犹豫不决了。1933年1月30日的震惊事件促使所有共和派自卫组织采取了仓促行动:给抵抗运动干部的首批战斗准备命令已匆忙发出,各队队长拆开早已发给他们的密封指令,万事俱备,只等待决定性的出击命令。在此期间,赫尔特曼的秘密联络员几乎都和衣入睡;他们从苏尔和策拉-梅利斯的兵工厂搞到了武器,并指挥将其大部分运往奥格斯堡、纽伦堡、马格德堡和汉堡等地。²¹

对希特勒政府迅速出击的迹象日益明显。工会系统已经讨论了发动一次总罢工的计划;在一些工厂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企业战斗小组《铁锤队》也作了反希特勒起义的演习。汉堡的同志也作好了内战的准备:机枪刚刚运到就被部署起来,为保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大楼和当地全德工会联合会的中央机关。

鉴于如此高涨的战斗热情，党和工会的领导人不甘落后。他们那种最初出现的悲观情绪似乎已经消失。还在去年，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最高领导人曾在巴本总理发动反对合法的普鲁士政府的政变时制止过国旗队的一次抵抗行动，现在连他们也发出了豪言壮语。铁路工会的干部汉斯·雅恩说，总罢工时，任何机车都不会开出去；全德工会联合会第二主席彼得·格拉斯曼保证：“我们只要按一下电钮，一切都将停止转动。”^②

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同志曾有短暂的时间再次考虑他们是否应争取共产党人为反对纳粹采取联合行动。一天以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曾建议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共同发动一次所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参加的总罢工；在吕贝克已经爆发了一次联合组织的罢工。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拒绝了这一建议，主要因为共产党（如同施坦普费尔在苏联大使馆同意下曾经进行过的会谈那样）不愿意签订那个“互不侵犯条约”，社会民主党想依据这个条约建立一个迄今仍相互敌对的两党的行动联盟：德国共产党应保证停止其对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恶毒宣传。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兄弟之争，这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派的一大弱点。他们的每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比纳粹更凶恶的敌人。德国共产党大肆鼓动空泛的革命热情，并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开路先锋来进行斗争；反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为了不使自己党的全部左翼丧失给德国共产党，竟闭关自守，以露骨的反共产主义来反对左派。典型的例子是，1928年至1930年间，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内政部长在内阁里谈及政治激进主义时，总是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但从未对准过纳粹党。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现在仍然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结盟建议。

1月31日，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同议会党团的代表以及钢铁阵线的代表会晤，这时他们所谈的又是“作好紧急应变所必要的行动准备”。现在，人人要求采取某种“行动”，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行动准备上落后于人。格拉斯曼和他的同事威廉·施特表示要同党的任何“行动”团结一致：“只要你们发出号召，我们随叫随到！”福格尔也竭力保证说：“一定会发出信号的。”²³可是大家等待的这个信号始终没有来到。

因为在此期间，有个人回到了柏林。他一向对国旗队的行动计划持怀疑态度。这个人就是奥托·韦尔斯。尽管他事先早有所闻，而且他在1月30日前不久还从瑞士打电话给福格尔要求必须举行一次总罢工以制止希特勒上台。²⁴可是他现在对这样一次总罢工也听不进去了。而对所有其他计划，特别是那个来自“幻想者”赫尔特曼处的计划，韦尔斯只把它们看作浅薄的做法。对业已发生急剧变化的事态，他不能熟视无睹：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党总是认为，如果共和国面临纳粹分子的暴乱行动，警察将会站在它的一边保护共和国。但如今整个警察机器已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因为他无论如何是合法进入总理府的。更糟糕的是，国防军也站到了希特勒一边（当然还有冲锋队和钢盔团）。用这么几根手枪、步枪和机枪来对抗国防军、警察、冲锋队和钢盔团，其后果是显然可见的。

此外，韦尔斯、布赖特沙伊德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过于相信民主，致使他们不能不考虑到对新政府采取暴力行动的合法性问题。拥护希特勒的选民达一千一百万人，他们一再促使纳粹党（尽管它在1932年11月遭到挫折）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纳粹党与胡根贝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联合在一起，就几乎占有国会全部议席的一半；反之，社会民主党只有五分之一多一点的议席。实际上，国会根本不起一点作用。普鲁士人布劳恩认为，与这样的国会打交道，任何一届内阁都无法领导政府工作，也只有实行专

政了。²⁰如果说,还有一位党的领袖,他——纯粹按数字计算——能够在国会内组织一个多数派,那么这个人就是希特勒。要是他接受非常愿意参政的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联合建议,那么这位德国总理本来就可以在国会中轻而易举地占有绝对多数。

但是,希特勒选择了另一条对他来说非常典型的道路:他立刻解散了国会,并宣布3月5日进行新的选举,因为希特勒只有通过再次煽动群众的全部热情和本能,才有希望达到纳粹党的独裁统治,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国家。但是,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这批形式主义的民主派在这次新的选举中没有能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倍倍尔和艾伯特的党由于把整个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归功于用选票进行的民主竞选,因而它不可能突然反对选举。

社会民主党的简单逻辑是:只要希特勒保持宪法,党就不允许采取国会外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只会有损于党,甚至向希特勒提供求之不得的借口,以此开始破坏宪法,而这也正是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以制止的。

于是,1月30日《前进报》晚报写道:“面对具有政变威胁的这个政府,社会民主党和整个钢铁阵线以其双脚立足于宪法和法制的基础上。他们决不会离开这个基础迈出第一步。”党的领导也不会排除德国人民的多数选举希特勒的意志,而且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会愿意去反对人民的意志。赫尔特曼的部队机关报
20 《国旗报》写道:“如果这个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会按照民主观点去作出决定的。”²¹

这种想法固然很民主,但却是个灾难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会把社会民主党和民主派的最后援军推入不幸的深渊。因为韦尔斯和他的朋友们并未认清他们面临的这个人心灵深处的本性:希特勒决定,在投票之前就利用任何机会废弃民主和法制国家,以赤裸裸的街头恐怖来反对和阻挡政敌。